

多，如高著所述，由於共產黨顯出積極抗日的姿態，才吸引許多知識人投奔共產黨的「我們」。如果認同中國的「敵人」，文化革命要求所有中國知識人都成為黨的「我們」，也沒有甚麼不對。高著在中國現代史學上堪稱突破，堪稱相當紮實的非官修中共黨史的典範之作，但也坦

露了當今知識人仍然缺乏可以清楚辯護的立場，提出了如何走出黨的「我們」的問題。面對當今「新左派」的「我們」強暴史實，過度解釋「延安民主」、「鞍鋼憲法」所謂的偉大「歷史意義」，史學家們不僅需要糾彈史證，也得面對「政治」解釋學。

荒謬與智慧的文本

● 倪樂雄

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卡特和前國防部長佩里合著的《預防性防禦》提出的思想分幾個層次，就其最高層面而言，整個軍事、外交政策是建立在「防患於未然」、「居安思危」的基礎之上，這是作者從自己國家的最高利益出發，總結了本世紀美國兩次被動地捲入世界大戰歷史經驗後提煉出來的。



艾什頓·卡特、威廉姆·佩里著，胡利平、楊韻琴譯：《預防性防禦：一項美國新安全戰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卡特 (Ashton B. Carter) 和前國防部長佩里 (William J. Perry) 合著的《預防性防禦：一項美國新安全戰略》（以下簡稱《預防》）是一本研究美國現行軍事、外交政策和行為的重要著作，汪道涵和王逸舟分別為此書的中文版寫了序言和導讀。它的重要性之一就是作者不僅在位時按照這一思路行事，而且他們的繼任者在目前和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按照書中的觀念行事。

筆者在仔細拜讀後認為，作者提出的預防性防禦思想分幾個層次，就其最高層面而言，整個軍事、外交政策是建立在「防患於未然」、「居安思危」的基礎之上，這是作者從自己國家的最高利益出發，總結了本世紀美國兩次被

動地捲入世界大戰歷史經驗後提煉出來的。比起一味強調自身利益，不考慮對手的正當利益而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災難性衝突，作者提供了在充分考慮對手正當利益的同時，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利益，在雙贏中奪得對國際事務主導權和主動權的思路和途徑。這一總體思路比起以往大國傳統的愚蠢做法確實高明了許多，而且充滿了智慧。

然而作者進入具體層面進行闡述時，其某些論點與論據之間不僅不相符合，有時簡直就顯得荒謬和滑稽。本文着重剖析《預防》一書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即為了防止威脅到美國和國際安全五種危險，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必須保持一支強大的軍隊（見「避免二十一世紀的危險」一節，頁14），指出其論證之嚴重缺陷。

卡特和佩里認為，以下五種危險構成了美國預防性防禦戰略的內

容：一、俄羅斯有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那樣陷入混亂和孤立，走上侵略道路；二、俄羅斯及其他從前蘇聯分裂出去的國家有可能喪失對前蘇聯核武器的控制；三、中國有可能走向敵對，而不是在國際體系中以合作的精神發揮作用；四、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有可能擴散，對美國構成直接軍事威脅；五、美國境內有可能發生其規模和能量前所未有的「災難性恐怖主義活動」。

筆者以為，姑且先不討論這五種可能是否會變為現實，僅就這五種可能是否能夠成立都很成問題。

首先，筆者認為俄羅斯不可能蛻變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趁德國失敗之際，採取了十分愚蠢的對德政策。坦率地說，《凡爾賽條約》相當程度上對德國是極其不公平的，其中強制劃歸波蘭的「但澤走廊」將

筆者認為俄羅斯不可能蛻變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這是因為當今國際和平體系根本不同於凡爾賽體系，在軍事安全上沒有對俄國進行不公正的限制，更沒有像當年對待德國那樣，強行將俄羅斯置於任人宰割的地位。所以，佩里和卡特想像中的「魏瑪俄羅斯」純粹是違反歷史經驗和常識的幻覺。



近代以來的中國外交行為基本屬「反應型」和「被動型」，而兩個國家的敵對或友好關係從根本上看是在互動中產生的，美國既然採取不排斥中國的立場，也就沒有必要擔心中國會走向敵對，更沒有必要在二十一世紀保持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對付中國。

德國強行分裂成德國本土和東普魯士，德國陸軍不准超過十萬、不准有空軍、不准有裝甲部隊等，這些規定都是極其糟糕和苛刻的，在其他歐洲國家軍事技術和國防力量日益發展強大的情況下，這些苛刻的限制嚴重威脅到德國的長期安全。著名英國歷史學家泰勒 (Alan J. P. Taylor) 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中曾客觀地分析德國挑戰《凡爾賽條約》的必然性，指出這是整個德國民族的問題，希特勒只不過是「德國民族的共鳴板」。1919年，盟軍總司令、法國的福熙元帥在《凡爾賽條約》簽字儀式後，即準確地預言：「這不是和平，這是一次20年的暫時休戰。」這表明將德國排斥在歐洲事務之外，不是德國挑戰凡爾賽體系的主要原因，真正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是置德國於任人宰割地位的《凡爾賽條約》本身。當時的蘇聯也被冷落排斥於歐洲事務之外，卻沒有發動一場大戰的欲望。因為冷落和排斥只能導致敵對情緒和小規模衝突，卻不值得去發動一場戰爭，但是，為擺脫任人宰割的地位而發動戰爭是值得的。當今國際和平體系根本不同於凡爾賽體系，在軍事安全上沒有對俄國進行不公正的限制，更沒有像當年對待德國那樣，強行將俄羅斯置於任人宰割的地位。今後也看不出有這方面的可能性。所以，佩里和卡特想像中的「魏瑪俄羅斯」純粹是違反歷史經驗和常識的幻覺。

其二，前蘇聯國家的核武器失控有可能發生，他們之間的矛盾錯

綜複雜，但跟遙遠的美國並沒有直接的矛盾，除非美國自己主動尋上門去找人家麻煩。不然，即使要動用核武器，也是他們鄰國之間相互殘殺的機率遠大於同美國發生衝突，就像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兩個核國家那樣。美國保持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與此中情況有甚麼必然的關係？

其三，關於中國有可能走向敵對，則完全取決於作為強國的美國自身在同中國打交道時是否掌握分寸，是否尊重中國的正當權利，如體現在台灣問題上的領土完整等。從中國統一後的幾千年歷史考察，一個強大的中國從不主動與另一個大國爭霸，但卻經常為自己的正當權益進行不妥協的鬥爭。近代以來的中國外交行為基本屬「反應型」和「被動型」，而兩個國家的敵對或友好關係從根本上看是在互動中產生的，美國既然採取不排斥中國的立場，也就沒有必要擔心中國會走向敵對，更沒有必要在二十一世紀保持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對付中國。

其四，大規模武器擴散，從總的方面看，不僅僅對美國構成直接威脅，對其他國家也構成直接威脅。把對全世界的威脅僅看成是對一個國家的威脅是個不小的常識性判斷失誤。再從另一方面考察，大規模核擴散同一個具體國家的安全並非一定構成正比關係。按常理，一個國家只能對自己的真正冤家對頭動用核武器，比如二戰後期，真正受美國核武器威脅的僅有日本，而中立國和同盟國家則實際上不受

其威脅。所以，只有在美國準備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為敵的前提下，大規模核擴散才能同美國直接受威脅的程度成正比關係。佩里和卡特的結論裏是否已安排好這種前提呢？

最後一個理由有點滑稽，即美國國內有可能出現規模和能量都前所未有的「災難性恐怖主義活動」。從邏輯上講，只要是恐怖主義性質的活動，其規模必然很小，能量必然極其有限。正因為恐怖主義力量與國家力量不成比例的弱小，所以要採取超常規的手段，違反社會正常遊戲規則來表達和實現自己的意志。如果恐怖主義的力量大到足以同國家正規軍事力量相抗衡，那就不屬於恐怖主義，即使早期是恐怖主義，現在它將遵守正常遊戲規則開始角逐國家權力，這就是內戰。所以，美國需要一支強大軍隊來對付恐怖主義活動這一觀點完全不符合邏輯。退一步說，假使存在這樣一種「規模和能量都前所未有」的國內恐怖主義活動，其正確的對策是建設一支「規模和能量都前所未有」的國內警察隊伍，這既符合邏輯又符合實際需要，何以會得出保持一支強大軍隊的結論？這不是南轅北轍嗎？

分析至此，可以發現《預防》的作者論證的蒼白和無力，然他們一旦進入具體操作過程時，思路既清晰又極有章法，處理事情既有章法又合乎邏輯。這種智慧與荒謬共存的現象，其根源是追求國家利益和追求真理在作者思想中的衝突，用形而上的術語來表達，兩

位前國防部長都是美國第一流戰略家，因而同時具備了極強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意識，而且當兩種意識在他們心靈深處發生衝突時，必然呈現兩個極端共存現象——卓越的智慧與非常的荒謬同在。

讓我們從概念的天空回到現實，既然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必須保持一支強大軍隊的五個理由難以成立，那麼美國真正的理由是甚麼呢？筆者以為《預防》中「未來的挑戰」一節裏的第一段道出了真相：一是確保美國的生存不受任何直接的軍事威脅；二是確保美國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軍事大國地位。「我們認為，美國安全戰略的一個首要目標應該是確保上述兩個條件能夠保持下去」（頁19）。作者應把二十一世紀美國保持強大軍事力量的結論建立在這兩個前提之上才是合乎邏輯的，不過這樣論證的話，追求霸權的意圖太赤裸裸，有些不好意思，於是費盡心機找了五個似是而非的理由。根據上述兩個條件背後預設的邏輯，任何一個正在經濟、軍事上崛起的大國都將自動成為美國的敵人，儘管他們在主觀上並不想與美國為敵。

預防性防禦戰略肯定使美國在軍事、外交方面呈現出許多不同以往的特點，根據「預防性防禦戰略」理論的內在邏輯推理，加之對近幾年來美國的軍事、外交行為的考察，筆者以為「預防性防禦戰略」的最大特徵是未來美國的軍事行動將比冷戰時期更具主動性和進攻性。

二十一世紀的美國必須保持一支強大軍隊的真正理由是甚麼呢？筆者以為《預防》中「未來的挑戰」一節裏的第一段道出了真相：一是確保美國的生存不受任何直接的軍事威脅；二是確保美國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軍事大國地位。「預防性防禦戰略」的最大特徵是未來美國的軍事行動將比冷戰時期更具主動性和進攻性。